

论西方传媒在中阿合作中的阻碍作用*

马丽蓉

内容提要 在西方传媒的霸权语境中, 中国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分别被臆造为“红祸”与“绿祸”, 尤其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9·11”事件的爆发, 西方传媒不但借“人权”来贬损中国形象, 而且借“反恐”来诋毁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东、西方传媒失衡的发展现状所产生的迥异传媒影响力, 最终导致了西方传媒语境中文化帝国主义的畅行无阻, 严重阻碍了中阿之间的正常交流与深入合作。因此, 中阿双方政府应高度重视软实力, 加强对外宣传力度; 两国传媒应更加专业化, 力争早日发出“自己的声音”; 有关中阿问题的研究应更加务实, 力争使研究和传媒达到互动, 最终促成中阿双方的实质性合作。

关键词 西方传媒; 中阿合作; 阻碍作用

作者简介 马丽蓉, 博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83)。

Abstract In the hegemonic context of Western media, China and Arab-Islam World are fabricated to “Red Trouble” and “Green Trouble”. Particularly with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the Great Power Status and the eruption of “9·11” incident, the Western media did not only play down China’s image by “human rights”, but also vilified the Arab-Islamic culture by “anti-terrorism”. The different media impact caused by un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media, leads to the unimpeded passing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in the Western media context and hinder the normal contacts and deep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s of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should think highly of soft power,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capability abroad. The media of two sides should be more specialized and make every efforts to give their “own voice”. The research in the area of Sino-Arab issues should be more engaged in reality. We should work hard to coordinate the research and media and promote the substanti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Key Words Western Media; Sino-Arab Cooperation; Hindrance

*本文属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项目(2005BGJ006)。

在西方传媒的霸权语境中, 中国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分别被臆造为“红祸”与“绿祸”, 尤其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9·11”事件的爆发, 西方传媒不但借“人权”来贬损中国形象, 而且借“反恐”来诋毁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西方传媒统摄世界话语霸权之际, 西方传媒在中阿合作过程中所造成的阻碍作用不容忽视。因此, 梳理西方传媒语境中中国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被臆造的历史过程、表现特征及其主要原因, 旨在进一步澄清“中国威胁论”与“伊斯兰恐怖论”等问题真相, 尽快清除中阿文化交流中的强权干涉, 以儒、伊文明的进一步沟通来促进中阿之间的实质性合作。

(一)

西方传媒在竭力塑造自我“正面形象”的同时, 一直致力于塑造异己制度的共产党国家——中国的“负面形象”。于是, 与中国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均程度不同地陷入被国际受众普遍误读的泥潭。

西方传媒一直以“救世主”的潜念居高临下地传布在它们看来极需拯救的、愚昧、落后的中国形

象。尤其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 美国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报道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70年代随着尼克松的访华, 在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中国热, 尽管当时的中国正值“文革”——践踏人权的灾难之时, 但大熊猫、中医针灸、万里长城、自行车、北京故宫甚至毛式蓝装都成为美国记者争相报道的新闻, 中国变成了一个新奇而浪漫的国度。显然, 这是一个极不真实的中国; 在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 伴随着西方各种社会与文化思潮的不断涌进, 出现了许多年轻人盲目追求物质满足和西方化生活等不可避免的崇洋之举, 但这些在美国媒体看来, 与自己的老对手苏联帝国相比, 当时的中国简直就是天使的化身。于是, 邓小平连续两次被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选为风云人物, 标示着美国媒体对中国改革总设计师的高度肯定, 但也不乏掺杂了美国政府对改革之初所出现的一些盲目西化的消极现象的某种鼓励; 90年代,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成熟期, 西化追风的消极做法逐渐被“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理念所取代, 国民经济在持续保持了8%

增长率的同时,加快了申请加入 WTO 的步伐。但“对这些,美国媒体没有兴趣,它们眼中只有李文和、李登辉、达赖、政治献金、卫星技术泄密、‘法轮功’。”^①尤其是 1999 年 5 月 8 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在大肆炒作“误炸”、“意外轰炸”的同时,将在美国驻华使馆周围抗议的中国学生诬陷为“暴徒”,美国外交人员则成了“实质上的囚徒”,甚至别有用心地影射中国政府利用学生而煽动了一场“从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以来最大规模的反美运动”^②。媒体便配合政府将中国视为继苏联之后的又一个政治对手;近年来,面对和平崛起的中国,西方世界均程度不同地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意识形态的冲突和经贸摩擦在所难免,“而中美一发生冲突,如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中美撞机,在这些冲突中,中国本来是占理的,但是,从美国媒体和美国舆论的反应看,中国的形象是一次比一次坏。”^③甚至中国突发的“非典”疫情也被西方传媒炮制为“中国病毒”,成为它们肆意进行政治攻击的又一“口实”。美国兰德公司亚太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斯文发表了《不要妖魔化中国》的文章,指出“一股令人不安的潮流正凶猛地袭来”——美国学术界和传媒领域都热衷于将中国描绘成忙于扩军备战的“好战者”且对美国乃至全世界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可以说,“中国威胁论”就是美国政府、学界和媒体共谋的产物。亨廷顿就把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明视为西方文明的主要威胁之一:“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所有其他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④且不究这种“非驴即马”的强盗般逻辑的杜撰,单就儒家文明重伦理、崇和谐的核心价值观所凸现的和平品质早已为西

方有智之士所首肯:传教士利玛窦眼里的中国是,“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海军和陆军”,但“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⑤在学术大师罗素心目中,“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只要中国人愿意,他们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因此,“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⑥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为首的西方传媒美化→丑化→妖魔化中国的原因及其方式是昭然可显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所以要美化中国形象,旨在以一个正面的、强大的“美好中国”去对抗苏联。为此,西方传媒主要采取避开政治、专谈风土的猎奇方式,最大限度地满足其国内受众对神秘东方文化的巨大好奇;90 年代前后,西方传媒由美化中国形象趋于欣赏“丑陋的中国”,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讲述旧中国老儿女的中国影片屡获国际大奖,这是西方电影评委对中国“审丑”情结的集中流露;近年来的和平崛起已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大国作用,这无疑对竭力推行全球霸权主义的美国而言影响极大,如何尽快铲除异己政治的中国便成为白宫官员的要务,也成为美国各大主要传媒的“政治任务”。于是,贬损、诬陷、夸大、歪曲、失真甚至无中生有都成为美国传媒关于中国报道时的惯用伎俩。它们甚至采用脸谱化的方式将天安门、五星红旗和毛泽东画像等均定格在黑白分明的凝固画面中,将中国问题的报道有意置入一个阴暗、压抑、僵死的语境里作负面的肢解性处理。如在报道中国“非典”疫情时,英国的《经济学家》就在封面毛泽东头像旁用大字题写道:“萨斯病毒: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吗?”与此同时,美国《时代》周刊更在五星红旗的图片下赫然标注:“萨斯国家:这个传染病正在改变中国”。不仅如此,类似满怀恶意的报道还受到了鼓励和赞赏。1999 年度的“普利策新闻奖”就颁发给了《纽约时报》记者杰夫·格什,获奖之作竟是其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出售技术的系列报道。可见,“一条新闻之所以成

①李希光,赵心树:《媒体的力量》,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版,第 248 页。

②同①,第 139 页。

③同①,第 249 页。

④【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55 页。

⑤转引自金德湘:《中国的和平外交传统与西方的“黄祸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 年第 11 期,第 13 页。

⑥【英】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1、167 页。

为新闻,仅仅是因为竞争对手报道了它。”^①况且,“从全球传播角度看,因为各种受众群体对其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象征符号本身的意义是模糊的,而且不同的媒体生产者在使用这些符号时,用意也大不相同。受众和使用者对这些象征符号的不同理解取决于他们所在社区的社会与文化共识。”^②

于是,对于长期不明真相的、多年被动接受主流传媒灌输的普通西方受众而言,他们的想象推理也只能是如此简单的臆想式过程:赤色分子→共产党→共产党国家中国→国民愚昧、政治专制、经济落后→妖魔化中国→中国威胁全世界的安全→红色与暴力→“赤色威胁”→全球仇儒恐华……西方传媒在不断贬损“中国形象”时所隐含的传播议题也可略见一斑。

(二)

同样,西方传媒也一直致力于塑就异己文化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负面形象”。因为,超级大国的决策者及其传媒“早在‘9·11’事件之前,就已经在阿拉伯、伊斯兰中寻找并设定‘无赖国家’和‘邪恶帝国’了,伴随这种政策导向的,是西方的影视、电子媒体、印刷媒体中充斥着将伊斯兰和恐怖主义,或阿拉伯和暴力,或东方和专制等同起来的负面的定型形象”^③。

其实,西方传媒大体历经想像化→类型化→丑恶化→妖魔化→恐怖化的演绎逻辑而塑就了这个“负面的定型形象”:西方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最初想像是建立在沙漠游牧民族这一基点上的。但二次大战后,西方人心目中的阿拉伯民族是“从骆驼背上的游牧民族这一粗略模糊的原型形象变成了代表着无力与易败的漫画式形象:这就是人们对阿拉伯人的全部想像。”更为不幸的是,在“阿以战争之后,阿拉伯人的形象再次发生了变化:显得更具威胁性。卡通中不断出现阿拉伯酋长站在油泵后面的形象”^④。而这种静态的、含沙射影式的表述遮蔽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发展的潜在能力和历史过程,导致阿拉伯—伊斯兰形象沦入臆想,甚至类型化之中;由个体形象的人物出场到群体充

塞的场景描述,甚至将反犹太主义的个体目标置换为排阿主义的群体对象,这是西方传媒肆意丑化阿拉伯—伊斯兰形象的基本路径,而巴以日趋激烈的冲突和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等外在因素更将丑化行径推向了极致;当“妖魔化东方”的政治、历史、文化乃至学术倾向等逐渐渗透到大众传媒的各个层面时,便出现了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简单粗暴地加以表述并制作出大量的反映愚蛮的赶骆驼的人、恐怖主义者和盛气凌人的阔酋长的电影、电视节目等,借此向人们不断灌输由发达的传媒技术所塑成的纵欲、懒散、宿命、残忍、堕落甚至血腥等影画形象,为西方人在中东攫取能源和发动战争寻找借口;自苏联解体后,西方传媒又将目光转向了东方,在东方化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邪恶帝国。其结果是,各种媒体中到处充斥着欲将阿拉伯—伊斯兰形象推入恐怖深渊的明显倾向。尤其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炮制和“9·11”事件的发生,不仅使美国的政治思潮走向了极端化,还使西方传媒所鼓噪的“伊斯兰威胁论”甚嚣尘上,更使美国媒体越来越受制于政府。更何况,“欧洲对伊斯兰的兴趣并非来自好奇,而是来自对伊斯兰这个一神论的、在文化上和军事上都令人生畏的欧洲基督教的竞争对手的恐惧”,这种“恐惧与敌视相混杂的情感一直延续至今。”^⑤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加快改造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新战略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方传媒对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的报道立场与表述方式,与此相关的话题更被蒙上了恐怖的阴影。

可见,从二战前→二战→冷战→后冷战时代,西方传媒或公开或隐蔽地在长达近百年的传播实践中“重塑”了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本相相去甚远的一个臆设形象。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学者更为这一失真形象加上了霸权性的解释:“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但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

①李希光,赵心树:第251页。

②同①,第246页。

③朱威烈:《〈当代中东国家社会与文化〉总序》,载《阿拉伯世界》2002年第4期,第4~5页。

④【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66页。

⑤同④,第441页。

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①美国著名伊斯兰问题专家埃斯波西托曾客观地指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运动并非必然是反西方，反美国和反民主的。尽管他们对既定的秩序和专制政权过时的推断发起了挑战，但它们并非必然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更好地理解穆斯林世界的历史和现实，承认伊斯兰教的差异性和多种不同面孔。这一路径可以减少创造自我应验的预言（即论证西方反对一种激进的伊斯兰的战斗或一场文明的冲突）的风险。”^②尽管美国欲以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之名，利用美国的民主与自由价值观来改造长期以来伊斯兰教占主导地位的中东国家，但阿拉伯人创立了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又反过来促进了阿拉伯民族的发展，阿拉伯民族思想和伊斯兰思想密不可分，互为因果。因此，美国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施压、诱拉与渗透意识形态的“大中东”战略，尤其是假借“反恐”名义的民主干涉与政权更迭，不仅严重挫伤了广大穆斯林的历史和文化自尊，还因虐囚、亵渎《古兰经》乃至焚尸等丑闻的频频传出，激起国际社会对美国一向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广泛质疑。

事实证明，国际社会对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的基本认知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国际传媒的新闻报道，尤其是那些权威性高、影响力大的国际传媒。因此，西方主流传媒对此问题的确认与传播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它们既可充当一般传播中介的角色，还可对此问题起一种“定型”甚至“定性”的作用，其报道的议题和方式都会影响国际舆论和国际受众对此问题的评价和定位。无论如何，一个有影响力的国际媒体必然是拥有公信力的国际媒体。只有赢得了受众的普遍信任，才有传媒广泛影响力可言，两者是互为因果的。西方强势传媒所鼓噪出的“伊斯兰威胁论”乃至“绿祸”论正是其在“重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过程中的文化霸权主义使然，表明西方传媒可信度的惊人缺乏缘自霸权主义统摄新闻的可怖事实。尤其是伊拉克战争更让人们充分感受并意识到一些国际媒体为了达到某种

目的不惜制造虚假新闻的丑恶行径。

于是，被西方传媒所塑造的、由恐怖、暴力和专制等要件构成的、远离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本相的这一“负面的定型形象”便日积月累，深入人心。在此失真形象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受众的想象性推理过程也大体形成：“9·11”事件→本·拉登→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绿色癌症”→反恐→泛恐→全球仇阿恐伊……西方传媒在不断歪曲“阿拉伯—伊斯兰形象”时所隐含的传播议题也就昭然若揭。

（三）

西方传媒对中阿政治、经济与文化合作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是潜在而长久的。在西方传媒强力鼓噪“红祸”、“绿祸”论之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更将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抑或是二者的联手视作西方最强劲的威胁，甚至武断地认为：“儒教—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联系将会继续，或许还会扩大和加深。这一联系的中心是穆斯林和华人社会在武器扩散、人权和其他问题上反对西方的合作。”^③因此，在研讨“新世纪中阿合作的战略基础”、“中阿合作的动力和阻力”以及“中阿合作中的学术交流作用”等重大而现实的课题时，切不可忽视由西方传媒的国际传播政治性所致而严重阻碍了中阿沟通与合作的严酷现实，必须尽快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以减少或铲除中阿沟通、合作中的“西方传媒”的干扰因素：

首先，政府应高度重视软国力，加强对外宣传力度。

众所周知，约瑟夫·奈所提出的软国力（软权力）这一概念，主要是指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尤其包括该国的国际形象、民族士气和精神面貌等。西方国家凭借超强的政治霸权和发达的传媒手段等先在优势而竭力向外倾销国家“正面形象”，美国更是如此。在总统艾森豪威尔看来，“在宣传上花1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5个美元”。在“9·11”事件中，美国主流媒体代替政府宣战，成为空前罕事而令人瞩目。在此事件后，布什签发总统行政令专门创建了全球传播办公室（The Offic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s），旨在争取全球反恐的国际舆论、修复美国对外形象。美国政府在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时尤其重视国际舆论的精心打造，近年来甚至频频打出灾难外交牌，赚取了世人不少的同情分。美国

①【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页。

②【美】J.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

③同①，第266～267页。

两任总统亲自出马为东南亚海啸筹募捐款就是明证。同样,以色列也极为重视对外宣传,形成了一整套的媒介公关策略,尤其注重对华宣传。其中包括“利用一切机会与中国驻以色列和中东地区记者交朋友,使其在到达以色列前就对这个国家产生亲近感”,“邀请相关的专家、学者、媒介负责人前往以色列进行访问,并长期保持联系,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以色列在中国的院外集团”,“通过外交官的广泛社会活动,大量接触中国各阶层,频繁在中国媒介中曝光,树立国家的形象”,“跟踪媒介报道,并进行适当交涉”及“资助学术研究和出版活动”等^①。必须承认,因种族、宗教乃至政治等固有偏见所致,西方传媒往往宠爱以色列人而冷落阿拉伯人,对牵涉阿拉伯—伊斯兰“恐怖活动”的报道乐此不疲,极尽歪曲之能事。同样,在西方传媒有关亚洲的报道中,日本的正面报道多于中国,中国的负面报道多于日本。更不幸的是,中国形象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是模糊的,阿拉伯—伊斯兰形象在中国也是不清晰的。结果造成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尽管中国的中东政策是同情和支持阿拉伯正义事业的,但是,中国的青年人,特别是青年网民已经大部分站在了以色列一边,他们公开在网站论坛上攻击政府的外交政策,强烈抨击中国媒介有关中东问题的报道立场,对客观报道巴勒斯坦问题的记者进行人身攻击,极力贬低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对美国 and 以色列充满了同情、崇拜和支持。”而这一怪现象的出现,“固然和中国当代青年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发生剧烈变化有关,与西方媒介控制和左右世界信息渠道有关,但也与阿拉伯国家对外宣传不力,尤其是对华媒介公关失败有着密切的关系”^②。而台湾等敏感问题仍会干扰到中阿正常的交流与合作,也与中国对阿宣传力度不够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中阿双方都应高度重视在国际舆论中树立国家正面形象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为此,汪道涵先生在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创建之初就强调“要用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精神来重视国际传播这个重大课题”,“研究如何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③。

①马晓霖:《中国媒体中的沙特阿拉伯形象》,载《阿拉伯世界》2005年第1期,第34~36页。

②同①,第34页。

③李希光,赵心树:前引书,第252页。

其次,传媒应更加专业化,力争早日发出“自己的声音”。

显而易见,“半岛”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专业化的精心打造,“从选题的策划、议程的设置、现场画面的拍摄到后来决定采访哪些人全是由他们自己制定的,而不是跟随CNN”^④。亦即,在借鉴BBC的运营经验时仍坚持阿拉伯—伊斯兰的报道立场;独家抢发或以独特视角报道有关中东地区的重大事件;尽量传播来自事件发生后双方的第一手资料以供受众更客观地进行评判;采集不同信源的讯息以构建多重报道语境来抵制西方传媒的单一的霸权语境。尤其是,西方传媒并未将阿拉伯—伊斯兰问题放在多重语境下进行客观、平衡的报道,而是植入政治的、复仇的、非常态的语境中进行霸权主义的报道,美国媒体更凸显出霸气十足的话语风格。尤其在“9·11”事件后,美国媒体高频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政治语汇,如“恐怖袭击”、“反恐战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先发制人”、“邪恶轴心国”、“文明冲突”、“恐怖分子”、“大中东战略”等正式进入美对外政策话语系统,逐步取代了旧的对外政策模式中的语言表达,此类话语帮助美国霸权主义者阐释并建构着“9·11”事件后国际新格局、世界安全新现实乃至国际传媒的舆论导向等。当然,与之相应的也出现了对抗霸权话语的新的政治语汇,如“圣战”、“人体炸弹”、“虐囚”、“反美武装力量”“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美军亵渎《古兰经》”及“驻阿美军焚尸”等也不断出现在“半岛”等非西方传媒上,力图借以摆脱霸权话语统治下的“失语”窘境。在“半岛”成功专业化的鼓舞下,我国央视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如出色报道伊拉克战争、顺利完成“西藏四十年”和“新疆五十年”等敏感专题的制作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央视正在向媒体专业化方向快速发展且成效渐佳,值得期待。

最后,国际问题研究应更加务实,力争使研究和传媒达到互动。

不容置疑,尽管国际传媒对国际事件的影响力并非直接发生作用,但它对国际政治和外交的深远影响是确实存在的,甚至从一开始就与国际政治和外交事务密不可分。在我们日趋依赖国际传媒来了解世界所发生一切的今天,国际问题研究越来越不

④李希光:前引书,第306~307页。

能回避“国际传媒”这一重大制约因子，尤其在进行中阿问题的研究时，更不能回避西方传媒不断干扰这一立论现实。因为，西方霸权的负面性的媒体报道，不仅影响了包括联邦调查局在内的不少执法部门官员对中阿民众的偏见性公务处理，还影响到西方影视、出版、学术等行业偏激的表述与评定。如美国传媒爆炒达赖、法轮功和李文和案、英国当局对“拉什迪事件”的粗暴处置、美国好莱坞电影对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形象的消极塑造等。尤其是，西方学术界在竭力贩卖“阿拉伯人只懂得武力；野蛮与暴力是阿拉伯文明的一部分；伊斯兰教是一种不容纳他人的、种族隔离主义的、‘中世纪的’、狂妄的、残忍的、反妇女的宗教”^①等所谓“专业水平的”有关中东学问的同时，西方传媒领域的所有讨论文字、框架、背景都受到此类思想的限制甚至定性。这种渗透于西方研究界和传媒圈的霸权话语体系所派生出的被放大的“伊斯兰威胁论”已在全世界各大传媒上不断滋萌和蔓延，尤其随着美国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整合”步伐的加快，西方传媒对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霸权性诠释也会进一步加强。同样，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受到西方传媒的不断干扰。“一项对美国几家主流媒体的统计发现，从标题看，50%是比较敌视中国的，25%是中性，25%稍微有些善意。如果按字数看，90%以上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媒体批评中国的文章既长，又看起来下了功夫。”^②可见，国际传媒与国际政治的如此契合便将中阿问题引向了国际关系的核心与国际问题研究的前沿。因此，国际问题研究必须与国际传媒由隔离走向互动，力争充分发挥智库服务于政府的务实作用。可喜的是，经过几年的努力，清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已初步建成了媒体、学术和政策三边互动的新的构架。

尽管卡塔尔的“半岛”与中国的央视已在国际传播的媒体比拼中有所作为甚至大有作为，但东、西方传媒失衡的发展现状所产生的迥异传媒影响力，最终导致了西方传媒语境中文化帝国主义的畅行无阻，严重阻碍了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尤其阻碍了中阿之间的正常交流与深入合作。唯有逐步揭穿西方传媒所臆造的“绿祸”甚至“红祸”的

文化霸权主义本质，才能更好地实践“中阿合作论坛宣言”所倡导的“尊重各国人民的文化和文明特性，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呼吁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营造合作、和谐的国际环境，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发展”^③。因此，对西方传媒在中阿合作中障碍作用的学理体认既具理论价值，又具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杨 阳 责任校对：李 意）

①【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2页。

②李希光，赵心树：前引书，第252页。

③《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载《阿拉伯世界》2005年第4期，第60页。